

寻找动词的
形而上学
赵汀阳

METAPHYSICS ON VERBS
ZHAO TINGYANG

寻找动词的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ON VERBS

赵汀阳

ZHAO TINGYANG

Copyright © 202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动词的形而上学 / 赵汀阳著.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7

(赵汀阳集)

ISBN 978-7-108-07644-1

I. ①寻… II. ①赵… III. ①形而上学—研究 IV. ①B081.1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071518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一千遍

责任校对 张睿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2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164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7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前 言

从我思（cogito）到我作（facio）

这个论文集选用的是20年来我关于形而上学的一些论文，大多数发表于《哲学研究》，有的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哲学动态》和《社会科学战线》。这里没有选入更早的形而上学论文，是因为，90年代后期以来我对形而上学的思考发生了变化，从问题到理论和方法都非常不同了，似乎不能合并同类项。

关于形而上学，我比较早的思考集中表达在1993年出版的《走出哲学的危机》和1999年出版的论文集《22个方案》里。那时我的“旧形而上学”大体上属于笛卡尔“我思”框架内的一些探索，受到了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影响，自称为“观念存在论”，即只限于“观念界”而不考虑实在界的反思，只研究什么样的观念是观念界里的“合法存在”，类似于逻辑学里的“合式公式”，另外其中也不难看出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但问题颇为不同。为了避免胡塞尔试图避免而事实上很难避免的心理主义，

我没有涉及相当于 noesis 的研究，而把研究对象限制于大概相当于 noema 的范围，并且更多地接受了分析哲学的标准，是一种混合了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形而上学研究。但关于“观念界”的研究并不太成功，我自己是这样看的，所以没有进行后续的研究，当然也有些学者朋友更支持这种唯心主义的思路。哲学没有绝对的对错。无论如何，早年的研究也有所收获，尤其是发现在“我思”框架内有着许多难以处理的事情，后来因此转向了新的问题。

观念作为仅仅存在于“我思”中的非实在之存在，其存在的合法性在哪里？这是早年的一个自寻烦恼的问题。要是采用经验主义的标准，就不得不承诺许多乃至无穷多的外部实在，那是康德也束手无策的自在之物，因此就需要证明观念与实在的契合关系（符合论）。这个哲学的老问题虽然有趣却永无普遍必然的证明，至少估计不会有哲学上的证明，或许将来会有量子力学的证明也未可知。我们能够知道的所有思想永远只是观念，因此无法以观念超越观念去证明观念之外的实在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怀疑论总是对的。因此，只好指望在观念界内部通过观念间的理性关系来建立观念的合法性。但这似乎是属于逻辑学、语言学甚至数学的问题，那么，数学或逻辑的规则足以解释观念的合法性吗？假如能够证明这一点也是好的，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比如我曾经论证说，如果引入布劳威尔的能行性标准，就可以在

实质上把一个观念的真理性“等价交换”为观念系统中的能行性（feasibility），或称可构造性（constructibility），于是，知识论就可以转换为观念存在论了。这是那时我很向往的“保守主义”标准，至今也坚持认为是一种很优越的最为理性的方法。从维特根斯坦的《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也倾向于支持这个直觉主义数学的标准。这个数学方法虽好，但有局限性，对于观念界不够用，显然不能解释所有观念问题。

能行性的标准本身是先天（a priori）为真的，然而奇怪或奇妙的是，它却不是先验（transcendental）为真的。通常，先天为真应该也先验为真。但直觉主义数学家怀疑这一点，因为我们并没有能力遍历无穷性，因此可没有把握断言先天原则在无穷多经验里先验为真。这是对康德的一个真正挑战。于是，先天（a priori）的有效性必须落实为能行性，才最后被确认为真，而能行性只在有穷步骤中有效，因此不能不负责任地推论其先验的普遍必然性（比如布劳威尔证明了即使排中律也并非普遍必然）。能行性原则很强大，我一直都相信能行性是观念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准，但能行性也确实存在着解释的局限性，由此可以发现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在逻辑和数学之外的问题。很显然，人类有许多最有意义或最重要的观念并非普遍必然，也无法必然证明，但那些观念就是这样的，并且确实非常有用，尤其是任何思想奠基所需要的那些基本观念。可以说，构成人类思想基础的

大多数观念都是无法绝对证明的，它们是创造性的。而且，即使在有逻辑、有规则或有秩序的事情上，人们也不断地即兴行为，在具体情况下对规则进行即兴创作（improvising），具体情况总是万变的，因此总是迫使人们对规则进行语境化的创造性理解。维特根斯坦遇到的一个困惑就是，在有的具体情况下，似乎很难必然地区分遵循规则（following a rule）和发明规则（inventing a rule）的行为。这种情况有点乱，但人们不怕混乱，所以事情就比较有趣了。

观念、理论、技术、价值乃至整个文明，都是为存在建立秩序，而秩序的原初基础是创作的而不是先验给定的，因此，形而上学或存在论试图寻找的本源并不在无穷远的时间远方，而就在脚下，就在人类的创作之中。创作即本源。由此我相信，存在不是存在论的问题，创世才是存在论真正需要解释的事情，而哲学一直错过了这个根本问题。当然，人们在神话或神学中谈论了创世，但创世被叙述为神奇故事而不是思想问题。生活需要故事，但思想不是故事，我们需要把故事变成问题来思考。

创世论一直被认为是属于神学的不成其为问题的信念而不是成问题的哲学反思对象，这是思想的一个根本错误。导致这个错误的一个狭隘认知是以为只有神创造万物才是创世，另一个刻板信念是，以为本源是超时间的永恒不变常数，比如绝对存在（being as being），可是无论是神还是绝对存在都对真实存在毫无说明，可见只

是故事。实际上，真正需要解释的“创世”和本源是创造了历史和文明的“创世”和本源，别的本源没有哲学意义，至多是神话意义，就是说，我们必须解释我们自己存在的本源。因此，创世论与存在论必须是同一的，否则各自都不是思想的对象。如果两者分离，就变成了无法被讨论的信念或假设，结果是，创世论和存在论各自都无法被说明。因此，被归入神学的问题必须转换为哲学问题，创世论必须转换为存在论，即形成“创世存在论”，本源就在其中。上帝创造万物，这是上帝的事情，上帝不负责创造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历史和文明的本源就是人的创作。上帝的问题归上帝，人类的问题归人类。

创世是“跨心物”的行为，内在性和外在性一体，无法被切分为思想和行为两个领域。心与物的分别或者心与身的二元论分别在创作的行为中消失了，因为创世行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存在论事实的及物行为，即思想与行为一体的事实，或者说，行为的主语、谓语和宾语同时以实在的方式在场（presence in reality），结构完整，无所遗漏。如果其中任何一项缺乏实在性就不是完整的存在论事实了。笛卡尔的“我思”（cogito）虽然是根本性的，但无法说明宾语的实在性，甚至也缺少实在性的谓语，因此无法解释创世（创作）问题。哲学显然需要一个新的出发点和思想框架，我的选择是，以“我作”（facio）为所有问题的初始出发点，“我作故我在”（facio

ergo sum) 的命题就可以通达许多关键问题，包括动词、共在、可能性、否定性、递归性等，当充分展开问题链，还可以通达其他所有相关问题，包括心与思、事与物，甚至政治与伦理，等等，而所有的关键问题在人类思想和生活中都递归地普遍存在。

思考创世存在论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大约从1996年开始至今，时有推进而尚未完成。大部分思考写在《一个或所有问题》(1998年初版，2023年修订)和《第一哲学的支点》(2013年初版)两本书里。这里的论文都是思考创世存在论的相关作品，包括一些尚在进行时的想法。这次结集，对这些论文略有补充。

有一点需加说明：facio非常接近古汉语的“作”，几乎完美对应，但一度考虑到容易混同为当代流行语中对“作”的歧义用法，在原来的书和文章里，facio写成“我行”或“我做”，但不完全准确，损失了创造性的含义。facio的意思是I make or I do，古语的“作”也兼有此轻重程度不同的两种含义，而“行”和“做”更多表达了I do的意思。因此，在此文集里，按照语境而改为“我作”和“造事”，比如与笛卡尔的公式“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对比时就写成“我作故我在”(facio ergo sum)，但在一般情况下，facio就写成“造事”。

此外，行文的某些语文措辞也略有修改。我的语文水平与试图表达的观念相比差之甚远，就是说，语文比较差。这里虽于措辞略有修正，但恐怕仍有别扭之处，

只好请读者多些耐心。语文能力非一日之功，尽管我已写作数十年，语文仍然不好。很羡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那样能以最清楚的语言表达最复杂的思想。记得维特根斯坦说过大致这样的话：凡是人读不明白的话语，就是作者自己没有想明白。我因此难免疑心，可能不单是语文差，恐怕思想也有某些没有想清楚之处。还请读者多多批评。

非常感谢三联书店的冯金红女士和设计师朱砂，他们给了这本很抽象的书一个友好的具体面目。

赵汀阳

2022年11月26日

目 录

- 前言 从我思 (cogito) 到我作 (facio) 1
- 一 第一个哲学概念：否定词 1
- 二 动词存在论与创造者视域 33
- 三 创世论的存在论 81
- 四 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 109
- 五 时间的分叉：作为存在论问题的当代性 141
- 六 关于形而上学的评论 177
- 七 追溯本源的方法和问题的递归性 217
- 八 形成本源问题的存在论事件 239

第一个哲学概念：否定词

引子 很久以前的讨论

大概在1988年，记不住是春天还是秋天，我和李泽厚老师在农科院围墙外林荫道上，以哲学的想象讨论人类意识和思想起源的问题。我们的讨论范围仅限于“真正的意识”即具有反思性的意识得以发生的文明条件，并未涉及人类意识的生物学条件，或者说，只涉及人文条件而不涉及科学条件。李泽厚老师相信工具的使用是形成人类意识的关键条件，因为工具使人第一次形成意识的间接性，于是，物质对象第一次不是作为直接对象而出现，而变成一个通过工具作用而被规定的功能性间接对象。工具固然至关重要，但我更相信语言的出现才是意识革命的条件，其中，否定词“不”的出现构成了思想的临界点。多年之后，我意识到，我们各自的哲学想象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几乎每个人文问题总是同时有

着多个有道理的解释，而且经常形成互相补充。显然，人类思想能力的形成需要必不可少的多种条件的共同作用，包括工具和语言，当然还有其他因素，诸种条件都同样是必需的，关键问题只在于到底何种条件是人类思想的临界发动点。在此，我仍然相信否定词是最终开启思想之光的临界点。历史无法重现而封存了大量问题，在历史沉默的地方，或许正是哲学想象的余地。为此，我试图为人类发动的思想临界点给出一个“化历史为哲学”的论证。

1 化历史为哲学

在近年来广为流行的《人类简史》中，赫拉利雄赳赳地描绘了人类如何“建构”了货币、国家和宗教等许多非自然事物。国家、规则和制度都是被建构的，这并非新奇观点。先前许多思想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马克思分析过国家是在阶级社会里被建构出来的，而在消灭了阶级的未来社会里，国家也将消亡；福柯分析过知识和权力以辩证方式进行的互相建构；维特根斯坦把一切规则和制度都理解为被建构的“游戏”或“生活形式”，如此等等，更不用说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的工作都是从建构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社会的建制，在此无须多论。赫拉利的新意在于，把人类的“建构”理解为基

于信念而生效的“虚构”^[1]。这个理解很有道理，但似乎过于强调虚构性反而可能遮蔽了规则和制度的实构性（factualization）。我使用这个有些奇怪的概念是想说明，文明的建构确实很可能始于唯心的虚构，但问题在于，并非任何虚构都可行，显然，唯物的实践将做出由虚到实的最后选择，实构的实践会形成对虚构想象的一个淘汰过程，就是说，任何能够转化为事实的虚构都必定能够确实解决生活中的某种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将在真实世界中被淘汰而转存为文学或哲学，因此，可行的虚构的另一面必须是实构。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有价值的虚构其实都是生活博弈问题硬逼出来的实构而绝不仅仅是迷人的想象。以博弈论的理解而论，人类的制度和规则都是在长期博弈中形成的稳定博弈均衡转换而成的，而博弈均衡显然是实践性的实构，绝非虚构。另外，虚构之初或凭借信念而成，但只要落实为生活形式，其可信性就主要是实践问题了，可信性最终在于可行性。信念仅凭自身无法自我作证，最终能够为信念作保的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实践的大量实例”，就是说，生活形式的最终基础并非信念而是实践的力量。

初始状态的人类不可能凭空产生意识革命。流行的说法是认知革命，但认知革命的概念容易暗示人类思想开始于知识问题，这却未必准确。早期人类的所有问题

[1] 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6页。

首先都是生存问题，其中包含认知，但还包括适应、即兴创作、赌博性的探索以及建立“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多半不是知识而是假设，甚至是迷信），因此，意识革命是一个更广义因而更合适的概念。人类的意识革命必定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事关生存而能够改变生活形式的奇迹般的媒介。每种媒介的发明都提出了新问题，也带来了新经验，因此开拓了新生活。可以说，文明早期的每一种媒介发明都是伟大的创造，都为生活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都有开天辟地的效果。比如，曾经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介绍了至少数万年前人类就发明了绳索，这个伟大发明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斧头和车轮。除了物质性的发明，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发明对于生存同样至关重要。通常认为，群体的合作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关于群体作为人类初始条件的理论论证可以追溯到荀子和普罗塔哥拉^[1]，很可能还有更早的反思。群体合作固然于生存最为要紧，却不是人类首次遭遇的新问题，原始人以及许多种类的动物的生活里早就存在密切合作，这个事实甚至令人想象到集体性也是一种先验基因。虽然合作是人类生存的原始基础，却不是发动意识革命的

[1] 最早把合作明确地理解为人类的初始条件的应该是荀子（参见《荀子·王制》：“人生不能无群……”）。另外，普罗塔哥拉也想象了合作的理由，但没有把合作理解为初始条件，他相信人类最早是散居的，后来为了增强力量就合群建立城邦（参见 Plato: *Protagoras*. Tr. Jowett, 322a-c）。

第一原因。合作行为曾经持续了百万年而没有导致革命性的改变，因此，真正导致意识革命的契机必定是一种介入性的奇迹，即切入到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中的某种“中间性”的革命性的媒介，它所开创的新经验足以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开启意识的新问题。

最古老的革命性媒介可能是也应该是工具。关于工具的科学和考古学研究已经很多，无须多论，其中特别重要的哲学意义是，工具使人类得以主动支配某些因果过程而把主观性加于自然过程，好似参与了自然运作（古人的说法是“与天地参”），因而使得人类的存在开始具有了主动性。不过，主动性与人得以自立的主体性之间尚有远途。工具建立的对因果关系的自觉意识肯定是意识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不少动物也使用工具（切不可五十步笑百步地认为动物的工具比原始人的工具粗糙得多），也有因果意识，甚至有艺术观点，却并未导致意识革命——当然，科学家可能会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动物的大脑功能不够强大。可是，即使有足够脑力的原始人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因果意识而产生意识革命，就是说，因果意识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原始人使用工具只是大大改善了生存境况，却在很长时间里（百万年或数十万年）并没有产生意识革命。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因果意识只是一种单项能力，不足以开拓全面立体化的思想空间，尤其不足以形成怀疑和争议的反思能力。即使在人类的成熟思想中，

因果意识也只能解释一部分思想问题。因果关系不足以解释逻辑分析和推论，也无法解释关于价值、情感、愿望和想象力的问题，更无法解释自由意志。可见，因果意识只是发达的动物心智，尚未革命性地升级为具有怀疑、逻辑分析和反思能力的自由心智。

如果工具意味着原始人类通过把握因果关系而在“生的问题”上获得一种主动性，那么，早期人类意识对“死的问题”的创造性解决也意味着另一种自觉性。死是仅次于生的重大事实，却似乎提出了更为震撼的问题：生乃是化无为有，虽无法解释，但生本身是好事，就不用追究了，可是，死把有变成了无，这就太震撼了。当有灵性的存在失去了灵性的迹象，这是难以接受的，灵魂哪里去了，更是不可理解。人类不可能不去思考这个惊心动魄的问题，因此，死的问题也很可能直接触动了人类的自觉意识（有迹象表明，少数动物，例如大象，已经有了关于死的悲怆意识）。德布雷相信人类文明可能就始于以图像去象征性地解决死的问题，因为考古发现人类最早的图像几乎都是生者与死者、人与神之间的媒介，既是一种交流，更是一种挽留。早期墓葬里的图像表明，人类试图拒绝生命的终结，试图通过永远在场的图像而留住消失的生命。图像召唤灵魂，从而使生命继续在场，因此，早期人类创造的图像不是艺术，而是神奇的方法，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手段”，就像打猎的工具一样有用。由于死像太阳一样“无法直视”，关于死